



叶玮玮:王老师好,您的著作《世界中的中国:文化、政治和世界观》(*China in the World: Culture, Politics, and World Vision*, 2022)堪称是从世界看中国的扛鼎之作。在此著中,您对康有为、梁启起的“天下大同”“国家主义”观点进行了鞭辟入里、深入浅出的评述。能否请您简单介绍一下康、梁的“天下大同观”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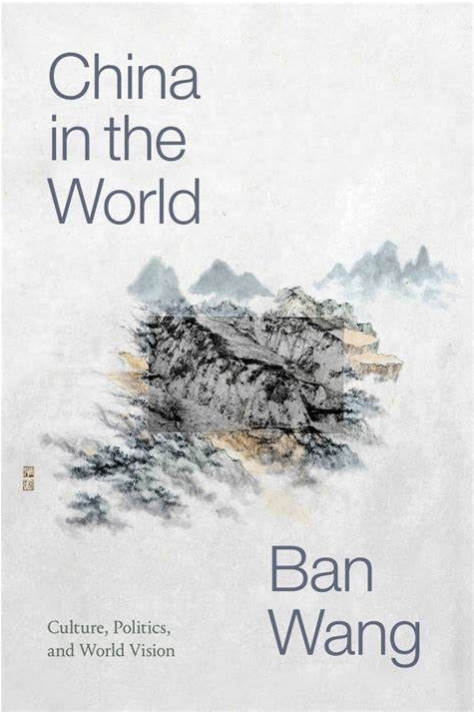
王 斑:康有为、梁启超生活在帝制转化为民族国家的时代,在政治活动和思考中,康、梁都意识到建立民族国家概念的重要性。康有为对西方殖民主义国家持批评态度,视其为世界太平的祸害和根源,认为殖民列强乃“自私其国、夺人之国”,扩张权利掠夺他人领土、市场、资源;倡导去国弭兵求大同。相较于康的思想,梁启超关于民族和国家的理解较为现实。

在梁启超看来,在当时的列强扩张时代,民族和国家能够很好地凝聚群体,确保同种、同宗、同俗之族群互为“同胞”,从而形成独立自主、组织民治的政府,为本国谋公益、抵御他族入侵。梁启超深谙西方民族国家的局限和弊病,在观摩巴黎和会和国际联盟时,梁就提出,世界大同为时尚早,但国联的诉求却与天下观遥相呼应,并由此提出“世界主义国家”概念:国人要爱国,但不能只认本国不了解世界。世界主义国家力图发挥其成员的天赋才能,把国家作为人类全体进化的一个手段,“不是把自己国家变得富强罢了,而是叫自己国家有益于全人类”。

叶玮玮:康、梁“世界大同”思想在推动中国走向世界层面扮演怎样角色?

王 斑:中国“一带一路”构想和实践,本身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诉求,可以说正在将梁的“世界主义国家”理想付诸实践。

叶玮玮:2017年,我在攻读博士学位之时,曾到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接受联合培养;在此之前,我从未想过文学研究能够被放置在“环境人文”这个“从地方到全球、从生态到万物”的跨学科新术语之下。我一度认为,中国学者追求纵深,西式学者偏向广博。您在新著《世界中的中国》第八



《世界中的中国》英文版封面

章中,也呼吁西方的中国研究应从中国本土生态视域重中世界主义,进行更纵深、传统的研究。是否正是因为您意识到,单就康、梁“天下观”及“新型中国世界主义观”的理解,西方汉学界与中国本土学者就有分歧?您认为,中西学界跨界对话需注意什么问题?

王 斑:是的。西方主导论述对“天下”话语一般持否定态度;他们认为,中国的“天下观”是要重组世界格局。在西方话语界,康德“普世主义”有绝对话语权;若是中国人谈世界,则容易被扣上以特殊性冒充普遍性的帽子;中国本土评论家谈“走出去”,容易被说成想重焕昔日大同。但如赵汀阳所说,当今世界甚至不足称为“一个世界”,仍有弱肉强食、丛林法则之感。

天涯异草

巴黎拉丁区,往昔文脉的失落

□沈大力



多米埃笔下的巴黎人

生长之地巴黎的畴昔失去辉光,表现了早期的“境遇主义”(le situationnisme)。苏波尔特在《巴黎最后的夜晚》,阿拉贡在《巴黎农民》里也表露了“巴黎夜梦”的神话。

我有幸得他们漫游后尘,目睹巴黎文学天堂的余晖。上世纪70年代末期,我到巴黎先游拉丁区,几度从巴黎大学广场踱步到对面的卢森堡公园休憩。卢森堡公园被称为拉丁区的“绿洲”,雨果选择这里作为他长河社会小说《悲惨世界》主人公冉·阿让终了的境遇。

我端坐在卢森堡公园王后回廊一座石雕像前,静思《悲惨世界》里的情节。此时,老迈的冉·阿让更名勒布朗,把珂赛特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,领她在公园僻径散步,偶遇青年玛丽乌斯。园内一片寂寥,鸟儿在野栗树荫中啁啾,一片良辰美景。白发老翁眼前年轻姑娘缓缓前行。

雨果描写道:玛丽乌斯似乎觉得,长达几个世纪的光阴突然变成一秒钟的刹那。他听见来者轻轻脚步声,低下头来。再抬头时,二人已经走到近前。年轻姑娘正凝神瞧他,那沉思的温柔目光令他浑身战栗。姑娘好像一腔怨尤,责备他这么久都没有来找自己,而且直说:“是我来了。”对着这双深邃无底的晶莹明眸,玛丽乌斯不禁目眩。那是一颗尚不熟悉的灵魂透出的眼神,仿佛拂晓的晴空。玛丽乌斯目不转睛,直到对方形影消失。

小说《悲惨世界》里,玛丽乌斯与珂赛特这对年轻情侣是在拉丁区卢森堡公园邂逅的。书中另一女子爱波丽特是巴黎顽童加弗罗什的姐姐,一直暗恋着这位青年。她手上有一封受珂赛特委托的信,要交给给他。当时巴黎民众正悼念遭杀害的拉马克将军发动起义,在尚沃尔里筑起街垒。玛丽乌斯守在街垒上,发誓与起义者共生死。爱波丽特急赶来送信,在危急时刻挺身挡住了朝玛丽乌斯射过来的子弹。顷刻之间,她将珂赛特的信交给玛丽乌斯,恳求对方吻自己一下,凄惨死去。这可以说是《悲惨世界》里最感人泣下的场景。总之,若说珂赛特的生母、柔弱的小女工芳汀是被拉丁区一个玩世不恭的大学生始乱终弃,珂赛特最后还是跟慈父般的冉·阿让回到拉丁区她这个人生的归宿。其情其景,仿佛昨日一般,自然闪现在今天来到拉丁区的异邦陌生人眼前,使人将小说中的关键人物与巴黎拉丁区的境界连接起来,在眼下的景致前边,浮想联翩。可见,巴黎拉丁区是个浪漫文学的渊藪。

漫步拉丁区时,我深感这里文学意趣浓厚,与伦敦、纽约的

在我看来,中西学界对话时应纵深、全面地理解“本土与世界”。关于“天下”,素有中国和西方学者忽略20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。我认为,20世纪中国历经改革、战争、革命,继承中国传统中可与现代价值能接轨的遗产。从民族国家和天下观融合角度来看,中国早已在“世界主义国家”的征途上。

叶玮玮:王老师,您的研究堪称“全球地方性”(Glocalization)研究的代表。您是否遇到过关于“何为生态批评或生态文学”类的基础问题?您如何看待“地方的即是全球的”这一说法?

王 斑:我会跟学生解释:生态批评是对环境污染、生态危机、气候变迁的思考;其核心论题是强调人的内在自然与外在自然的共存,反思“人类世”(Anthropocene),批评“人类中心论”(Anthropocentrism)。我素来对“人类世”持审慎态度:该概念忽略经济体制、生产方式对外在自然的索取,对内在自然即生产者的剥夺。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认为,不同的生产方式对待内在自然呈现出不同的态度和取向。

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时三百余年,酿成了破坏自然的恶果。生态危机并非产自现代农耕,也不可归罪于低消费劳动阶级。“人类世”概念将气候危机归于人祸,笼统对所有人为责,掩盖了资本主义体制的生态撕裂及阶级矛盾。我经常告诉学生,并不是人类整体造成了环境危机,而是某个历史时段的经济体制和资本集团肆意扩张的后果。“人类世”的说法,遮蔽了资本集团、金融权威和科技寡头生产方式的后果;它掩盖了一个事实:有钱人总有办法生存,至少可以多活几十年,甚至殖民外星球。所谓“人类的化石足迹”(human fossil footprint)更是大而无当的说法:它无视穷困族群被异化的现象;与那些开不起车、生活在窝棚、终身赤脚的人毫无关系。

叶玮玮:如此说来,曾经西方人文话题下的“世界文学”和“人类世”本质还是19世纪资本主义扩张语境延伸的话语,这样理解可以吗?

王 斑:没错。西方人文话题下的“世界文

学”和19世纪资本主义扩张是孪生兄弟。大工业的兴起,资本积累在全球的扩张,世界贸易和市场的发达,让歌德开始倡导“世界文学”。马克思也说,资本主义大工业不用本国的原料而攫取别国原料,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,也供世界各地消费。如此场域下的“世界文学”概念的提出,旨在将各民族的精神产品化为公共财产,地方文学也就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。但是,资本世界远不是一个对所有人都开放包容的世界;他有劳动分工、尊卑贵贱秩序,由资本金融统治奴役边缘,把世界分裂为统治和依附体系。强势国家从弱势地区攫取资源、剥夺劳力,破坏当地社群文化;这就是“生态帝国主义”和“生态殖民主义”的议题。西方人文话题下的世界文学的想象固然美好,但这样的残酷不平的世界,如何能造就世界文学的共享平台?

叶玮玮:王老师,我明白了。您躬耕践行着中国学界常谈的“平等对话”,想让世界听到多元本土世界的声音。生态文学作为从环境公正视角审视生态与人性、民族发展与多样物种的书写,是否具有“走出去”的先天优势?我是否可以这么理解,中国本土的生态文学就是“世界文学”;或者说,所有能被冠名为“生态”的文学,本身就有世界文学性?

王 斑:是的。我们谈“文学走出去”,所期待的是与世界接轨,是中国作品在世界文坛得到公平待遇,是确保国际读者能公正评价中国历史、社会和人心。上世纪30年代,上海周作人、林语堂等人倡议“文学世界主义”,就有同样的诉求。但是,彼时的他们是在殖民租借地发出这种声音,根本没入理睬。走向世界愿望很好,但当时的现实很残酷。当时的世界权力结构、文化交流其实很大部分保留着殖民主义的尊卑贵贱的秩序。中国文化虽然走出了国门,但远远没有进入到与平等交流的平台,因为掌控话语平台之人不会轻易让你成为座上宾。

当下,文学“走出去”有时会隐含着的一个迷思,即世界经济一体化和跨文化对话蔚为大观,繁华市容迥异,难怪人称之为“文学共和国”。从巴尔扎克和雨果或左拉时代以降,经过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至第二次世界大战,此地虽几经变迁,但其文学风貌始终如一。首先,区内各街巷遍布各类书店:在奥德翁剧场周围,我在“拉辛书店”到“弗拉马利翁书局”,特别是多家经营古籍书籍的小店里,兴致勃勃地翻看一堆堆藏书,时不时能碰到一些平日很难找到的作品老版本。那天在卡赛特街口,我进入一个很不起眼的、看上去相当混乱、由几个旧书摊组成的书铺。举目横扫几层木板书架,突然发现19世纪诗人奥古斯特·巴尔比耶(1805—1882)讽刺1830年革命果实篡夺者的诗集《抑扬格》(*Imambes*)和1848年革命诗人莫罗的一部《诗集》。取下这两本诗集,我向店主询问书价。他看我是一个不远万里来到巴黎的中国人,对一般年轻读者鲜为知晓的法国18世纪的诗人如此有兴趣,欣然将书免费相赠,意在交个异国朋友。须知,这类可能已成孤本的珍贵古籍,真要拍卖起来肯定价格不菲。我初次涉足六角国,就受到启迪。谁言资本支配下书商都重利?此乃虚言。更远一些,圣雅克街上的《彼岸》也经营旧书,一些难觅的历史、文化和文学典籍,对收藏家尤为可贵。但店主却无意居奇,仍按平价



卢森堡公园里的“王后回廊”

出售。“儒勒·凡尔纳科幻小说专营书店”亦然,包括多种异常精美的绝版书。沿着通向塞纳河堤岸的圣米歇尔大街走一趟,那边吉贝尔-约瑟夫书店等数家大文化企业是楼层建筑,十分显眼。购书者摩肩接踵,川流不息。在这儿,诗歌、小说、戏剧等文学作品应有尽有。我买到了几乎所有来法国前欲采购的书籍,果不虚此行。

从圣米歇尔喷泉向右转,到木柴坊街37号的“莎士比亚书店”,见其店抄录该书店创始人乔治·惠特曼的英文语录:“巴黎当地报纸称吾‘拉丁区的堂·吉珂德’,因为吾脑海浮想侵入云端,众人仿佛都变成了天堂里的安琪儿。”这家“莎士比亚书店”被誉称为最具乌托邦色彩的文斋,不乏其趣。乔治·惠特曼强调其意向:“吾志在开办书店,因为书籍营销是蓬蓬勃勃的生意。然生意系富有生命力的现象,即盎然生机,绝非纯粹‘做生意赚钱’。”莎士比亚书店对面的塞纳河堤岸是巴黎传统文化奇景。这里是左岸长达数公里的绿木箱旧书摊,千余“绿箱”里蕴藏着30余万册古籍书籍,堪称一处巴黎淘书宝地。右岸城岛上的巴黎圣母院让游人想到雨果的同名小说,似乎恍见吉普赛女郎埃斯梅拉达的倩影,以及她跟钟楼怪人卡西莫多、“太阳神”腓比斯和黑衣教士弗罗洛的瓜葛。附近开着“埃斯梅拉达旅馆”,一切表露着雨果文学传至天涯的浪漫遗迹,为拉丁区文化点缀,引动路过行人的怀旧感,驰想到巴黎景象乃是整个法国文学结构的核心。

然而,四十载春秋逝去。我于21世纪初重返巴黎拉丁区,情景已今非昔比。正如浪迹巴黎的诗人波德莱尔预感到的,

多元文化大门对所有人都敞开。但是,西方的“世界文学”,所依赖的是西方人文主义、启蒙传统。人文主义植根于西方启蒙时代的思想,注重理性、主体和自觉;在艺术上,倡导独创、想象和真情。如何与过去神权主导世界观和前现代的封建宗法秩序群决裂,才是现代民族国家的主流意识;这才是全球性思想的革命,是在世界传播的思想。人文主义近百年来华丽转身,一跃好像成为跨文化、跨国界的思想先锋。但是,君不见西方人文主义包藏着狭隘、偏见、傲慢和霸权,欧洲中心论及放大的民族国家论,以及奴役自然、劳动者、妇女和动物的“人类中心主义”。西方的经典小说常以个人成长的履历为重心,描写个人成长、家庭关系、社会和政治层面,着重谈及个人的自我及社会、历史的关联。比如,狄更斯小说《大卫·科波菲尔》完全嵌入早期维多利亚文化政治氛围内,描述那个时代的阶级和性别的作用,呈现大英帝国的风土人情。如此一来,西方的“自我”远没资格称“世界公民”,而是植根于某一地缘的表象。此“个体”更像是个四海漫游的异地探险家、经纪人、贸易商人、风险投资者。他足迹遍布天涯海角,掠夺当地自然和人力资源;其身后是资本财团和殖民帝国的船坚炮利,而资本全球的扩张是自由个体形象的推手和后盾。

如此,我们如果想要赋予文学以真正世界性,就必须突破西方传统的人类中心论。西方经典人文主义视角就很狭隘,人类之外的天地万物,仿佛只有在人的狭隘视野中才有意义和价值;外在自然环境不过是社会环境和文明发展被压抑的背景。也正因如此,生态批评上穷碧落下黄泉,视角深入地球万物万类,重视同呼吸、共命运的人与生物系统,触及气候、空气、植物、山川及生灵万类互联议题,能够作为挖掘文学的世界性的重要工具。如此,生态文学作为建构共同体的一方空间,自然堪称是真正的世界文学。

(王斑系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文化学院教授;叶玮玮系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)



“唉,城市的面目变化得竟比一个将死的人快得多!”悠悠光景逐流波。我再到拉辛街,梧桐叶落,但不见了书店的身影。圣米歇尔广场五层楼的“吉贝尔青春书店”因遭遇一场大火后一蹶不振,无奈转让地盘,周遭唯余原有的露天咖啡座,依旧照样热闹。沿着圣米歇尔林荫大道下行,索邦学府门旁的“大学出版社局”,由于租金过贵。已迁往它处。

文学的发展传播依靠出版社,可惜一些重要的出版社陆续迁出了拉丁区。上世纪80年代初,因我的好友龚古尔文学学院院士布莱斯是位于雅各布街“塞伊出版社”特别保留的主要作者,我常上那边去,还一度交涉过出版自己用法文撰写的小篇小说《悬崖百合》事宜。现如今,塞伊出版社搬出了雅各布



街,另一家“罗贝尔·拉丰出版社”已经从圣苏尔比斯广场迁走,“弗拉马利翁书局”总部也离开了奥德翁广场。巴黎几家大出版社相继离开拉丁区,让位给时髦服装店和盈利丰厚的鞋铺。过去,有萨特和西蒙娜·波伏瓦等文化名人光顾的圣日耳曼草地“花神咖啡厅”,不少作家带着准备付梓出手稿的手稿,到“两瓷偶”咖啡店商谈。圣日耳曼林荫道成了文学活动的标志。法国作家夏布洛尔曾经约我在花神咖啡厅见面,互通款曲。

而现在,这个街区在文学上却几近荒芜,再不见一拨拨“粉丝”崇拜文坛秀出群芳的名流在彼蜂拥蝶绕。出版家奥利维埃·贝杜赫奈确认:“四十五年中,我亲见这个区慢慢‘风化’,逐渐失去了往日实实在在的社交脉络,文学杂志尚存,对此地的活力非常重要。”“花神咖啡厅”、“王桥”、“圣日耳曼驿站”和“地中海”等处,旧貌没换新颜,颇疏文采,来客日益稀少,都到别处去逍遥度日。确实,现今的消费者如马埃尔贝克,或让·埃什诺兹等作家们想出头,已经不再需要像过去那种社交活动了。

显然,在经济离心力的支配下,“文学巴黎”已在拉丁区消逝,成了十足的弥尔顿“失乐园”。从圣米歇尔和圣日耳曼两条大林荫道放眼望去,昔日古香古色的书店群落已被琳琅满目、霓虹灯闪烁的时髦商店取代。拥有荷兰血统的巴黎通作家于斯曼的话说,“在此犹如到了大洋彼岸的谷物和牲畜集散中心,阴沉的美国城市芝加哥”。加速实现的“美国化”,让欧罗巴传统的拉丁区失去六角国的文化特性,特别是浪漫主义的诗魂,令法兰西儿女感怀伤遇,哀叹今朝巴黎失却了宝贵的、令他们引以为豪的“文学天堂”。